

唯心史观和投降主义

——试析《水浒》的“引首”

李健章

《水浒》作者，在写本书回目之前，写了一段“开场白”，题为“引首”。讲的是梁山起义人物出世以前，赵匡胤建立宋王朝到仁宗嘉祐三年这百年间的简史。我们过去看《水浒》，对这段“引首”很少注意，往往顺手翻过。其实，它很能说明作者的唯心史观和反动的创作意图，对我们认识这部小说彻头彻尾的反动性，颇有帮助。

捏造历史 为封建王朝唱赞歌

毛主席最近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毛主席这一指示，深刻地揭露了《水浒》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本质，点明《水浒》的要害所在，给我们指出了评论《水浒》的正确方向。

《水浒》作者宣扬投降主义路线，写成这样的反动小说，从其思想基础来看，是唯心史观。这条思想黑线，在“引首”中就暴露出来了。

“引首”列举的历史人名都是真的，身分和时代也大致相似。作者就利用了这点，来个偷梁换柱，想给读者造成错觉：好象宋王朝真有过那么一个黄金时代。实际都是出于他的主观臆造，完全颠倒了历史。

作者在开头就引了邵尧夫的一首七律诗，为给北宋王朝大唱赞歌定了基调。这首诗，是邵的《观盛化吟》两首之一，《水浒》作者引用时，只改动一些字句，原意未变。诗的内容，是渲染在宋王朝的所谓皇恩雨露下，人人穿绸着缎，处处歌管楼台，一片富丽繁华的太平景象。它把封建王朝统治下的黑暗社会，美化为神仙世界，人间天堂。《观盛化吟》的另一首，还有这样两句：“五事历将前代举，帝尧而下固无之。”《水浒》作者虽然没有引出这两句，但整个“引首”基本上是按照这个内容来叙述的。所谓“五事”，据邵自己解释，是指：赵匡胤取得帝位时没有用暴力，做皇帝后天下就太平了，从来没有“杀一无罪”，祖孙四帝就在位百年之久，在这百年内没有发生祸乱。这真是“盛德如天”！他简直是在模仿孔老二赞美唐尧那样来歌颂宋王朝，难怪要教如同“草木”的小民顶礼膜拜了。这个邵尧夫是一贯鼓吹历史倒退论的，胡说社会历史发展到了唐尧时代已登峰造极，以后便一代不如一代，但为美化宋王朝，他又换了历史循环论的调子，吹捧宋朝是唐尧时代的再现。

《水浒》作者，推崇这个“名儒”，并引用他的诗来定基调，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以他的观点作为论述这段社会历史和反映后来梁山事件的指导思想。如所周知，邵尧夫是北宋时一个出名的唯心主义者。他是孔孟的信徒，又是那个华山道士陈抟的再传弟子，搞了一套儒道合流的什么象数之学，用阴阳八卦和加减年月数字的机械方法，来推算社会的兴亡治乱，借以宣扬天命论、宿命论、历史倒退论、历史循环论各种反动思想，为封建王朝效忠说教。《水

浒》作者，正是承袭了这些唯心主义的破铜烂铁，把它们组成一条黑线，贯穿全书。什么张天师、九天玄女、天书符籙、忠义仁孝之类，就是这种大杂烩渣子的具体浮现。

作者为了证实邵尧夫所描绘的北宋王朝那种“天堂”式的社会生活，为宣扬投降主义路线张本，就捏造了宋仁宗时期从天圣元年到嘉祐二年出现所谓“三登之世”。胡说“那时天下太平，五谷丰登，万民乐业，路不拾遗，户不夜闭”。并高唱什么“万姓熙熙化育中，三登之世乐无穷”。什么叫做“三登”？这是儒家为美化奴隶制社会鼓吹复辟倒退而造的谣言。说农民种田九年，就储存了三年的粮食，这叫做一登。“三登”，就是储存了农民九年所生产的粮食。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唯心主义者也能捏造出来，这种撒谎本领，真使人吃惊！如果这种神话能变为事实，那不仅王朝仓库都要撑破，连“草木”小民也会胀得发慌。那么，在这样“国富民安”的“天堂”中，哪里还有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哪里还有啼饥号寒卖儿卖女的贫苦大众？于是，黑暗的封建社会，腐朽的封建王朝，人吃人的血腥事实，都被作者用这种骗人的障眼法，把它们伪装得花团锦簇。说穿了，作者所极力美化的“天堂”，不过是建筑在封建剥削制度上大官僚大地主的乐园。所谓“凤城春色”，如此而已。

作者在一些情节的具体描写中，也学着邵尧夫那首诗的调子，极力为宋王朝歌功颂德。请看他在第七十二回描写东京元宵放灯的情景吧。什么“道君皇帝庆赏元宵，与民同乐，此时国富民安，士农乐业”；什么“黎庶尽歌丰稔曲，娇娥齐唱太平词”，“天街上尽列珠玑，小巷内遍盈罗绮”；一边是皇上“赐万民御酒”，一边是老百姓“各作贺太平风景”。这幅“君民同乐图”，绘得多美呀！而这一切，作者又有意让宋江身临其境，从这个叛徒眼里透视出来。这种挖空心思的安排，无非是为宋江的叛徒嘴脸涂脂抹粉，把接受招安说成是合情合理，为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帮腔喝采。为封建王朝唱赞歌，就是要造反者缴械投降，这种关系不是摆得很清楚吗。

邵尧夫和《水浒》作者，伪造历史，信口开河，本不值一驳。但为进一步说明问题，有必要把王安石对形势的不同看法提一下。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提出一些现实问题，认为当时是“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这次上书，是嘉祐三年，也就是紧接所谓“三登之世”的第一年。王安石和邵尧夫是同时人，议论的是同一件事，只是由于他们的政治路线不同，法家的唯物主义和“名儒”的唯心主义不同，看法就不一样。

《水浒》作者，在“引首”开头表述自己创作动机的词中，还说了什么“评议前王并后帝”的话，好象他写《水浒》，是意在评论北宋朝政，反映历史。其实，他被唯心史观迷住了心窍，对历史的知识等于零。就拿前面我们已经分析过的那段东京放灯故事来说吧。作者在描写这个情节时，对昏君赵佶和腐败不堪的宋王朝作了无耻的吹捧，对当时黑暗的现实作了离奇的美化。这一套玩艺，从内容到形式，都和历史上蔡京为粉饰太平谄媚赵佶而鼓吹的“丰亨豫大之说”（见《宋史·蔡京传》），完全一样。作者在《水浒》中打起反贪官反权奸的旗号，并通过小说主人公宋江一再宣称：“皇上至圣至明，只被奸臣闭塞”。结果怎样呢？不但使宋江向奸臣高俅、童贯叩头参拜，做了奴才的奴才，而且作者自己也成为奸臣蔡京的门徒，充当蔡太师的传声筒。真是无巧不成书，成了绝妙的自我讽刺。唯心主义者，总是这样出尔反尔，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

当然，作者身分和蔡京并不一样。蔡京是王朝宰相，手中握有对付农民革命的硬的和软的两把刀子，而作者则是通过他的小说为封建统治阶级出谋献策而已。他献的这条毒计，就是歌颂和宣传投降主义路线，诱使造反者接受招安。其手法之一，是制造假象，美化封建王朝，散布幻想，麻痹人民斗志。你看，那“三登之世”的太平景象，皇帝“与民同乐”的欢愉气

氛，多么美好呀！这样，如果再造反，那真是“不仁不义”，犯了“迷天大罪”。因此，就引出这样的反动结论，叫做：造反该死，投降有理。

宣扬天命论 为不反皇帝造根据

决定和推动社会历史发展变化的，是神意，还是人力？这种伟大的支配力量，是来自少数的帝王将相，还是出于广大劳动群众？历史唯物主义，断然肯定后者而否定前者。唯心主义则相反。

坚持唯心史观的《水浒》作者，狂热鼓吹儒家的“天命论”，胡说天有意志，主宰一切，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引首”末尾，有这样一首七律诗：

万姓熙熙化育中，三登之世乐无穷。岂知礼乐笙箫治，变作兵戈剑戟丛。水浒

寨中屯节侠，梁山泊内聚英雄。细推治乱兴亡数，尽属阴阳造化功。

这首诗，具体地评述了北宋王朝社会政治的变化和梁山起义事件，表明他写作《水浒》的基本思想，因而全部暴露了他的反动的唯心史观。诗的头两句，是捏造历史，给宋王朝唱赞歌，为宣扬投降主义路线张本，我们在前面已分析过了。三四两句是转折，说那歌舞升平的“天堂”社会，忽然被一些造反者破坏了，变成兵慌马乱的世界。五六两句，是写梁山起义事件。破坏“礼乐笙箫治”、打乱了封建秩序的造反者，居然被作者称为“节侠”和“英雄”，这好象很怪。其实，正因为宋江们只反贪官污吏，不反皇帝，很象古代儒侠之流，所以称他们为“节侠”；而且造反是为“替天行道”，又终于“改邪归正”，接受招安，去打不“替天行道”的方腊，从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来看，这样难得的好奴才，自然是“英雄”了。末尾两句最重要，是作者从上述的历史变化中得出自己的结论。那就是，社会的治乱兴亡，都是阴阳造化之功，由“天意”决定的。

作者为了证实“天意”的存在，把皇帝神圣化，进一步宣扬投降主义路线，又大造“君权神授”的谣言。“引首”中充满这样一些神话：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是天帝为结束五代的纷乱而派遣的霹雳大仙下凡，这个“圣人出世，红光满天，异香经宿不散”。后来宋仁宗也是天上赤脚大仙降世。“玉帝”为了确保这代皇帝，还加派文曲星包拯、武曲星狄青前来保驾。也就是这些天神化身的帝王将相，创造了所谓“三登之世”的奇迹。作者把这段“讲史”演为神仙道化的闹剧，目的在于说明：赵官家是“受命于天”来统治老百姓的，他的政权动摇不得，反对皇帝就是“逆天”，那是万万干不得的。因此，他又引出一个反动结论，叫做：天命不可违，皇帝反不得。

全部《水浒》故事，都是按照“天命论”来布置的。请看，发生梁山起义，是由于天降瘟疫，使洪太尉到龙山打开魔王殿，放走了天罡、地煞一百单八个魔君。至于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还有什么“天书”，那更是道法无边的九天玄女所面授。她教宋江要以“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她不但密授了这条投降主义路线的原则和作法，而且还说了四句“天言”，对执行这条路线的转折关键和主要活动作了具体指示。后来，宋江的投降活动，故事情节的发展，都是按照玄女娘娘这个“法旨”办的。当宋江准备把投降路线公开的时候，恰好天门忽开，飞下了天文石碣。把天魁星宋江的领导地位和“替天行道”“忠义双全”的投降路线，作为“天意”，向众公布。宋江的叛卖投降终于实现了。在征辽中，那个九天玄女又一次露面。她一面赞赏宋江过去“能忠义坚守”，投降有功，同时又叮嘱他“勿生退悔”，把奴才行径坚持到底。在打方腊的睦州之战中，宋江先打了败仗，这个叛徒本应受到人民的处决，当然又是“天意”，凭空来个鸟神救了他，让他后来“衣锦还乡”，封侯庙食，表示奴才的“功

成果满”，为他的投降路线抹上最后一道灵光。由此可见，作者是把梁山起义的发生、发展，直到投降失败，统统归结为“天意”。这样写法，无非是借老天的神秘外衣，来掩盖阶级斗争和宋江投降主义路线的实质，把投降说成“顺天”，为叛徒诡辩。

所谓“替天行道”，它的理论基础，就是儒家的“天命论”。孔老二鼓吹“畏天命”，胡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咒骂“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不畏天命”和“畏天命”，从来就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种不同世界观的反映。就农民起义来说，它是革命路线和投降路线的主要分水岭。紧接天文石碣之后，宋江就在梁山顶上，“立一面杏黄旗，上书‘替天行道’四字”，作为投降路线的政治纲领。后来正式投降时，大队前面也打着“顺天”的旗子。所谓“替天行道”，实际就是孔老二“克己复礼”政治纲领的翻版。儒家说，“礼以顺天，天之道也”。不是恰好说明这个问题吗。孔孟把忠孝仁义这些属于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吹嘘为“天道”，强加于人。其目的，是为防止“犯上作乱”，不准造反。儒家把“天道”的政治涵义规定得很具体。他们说：“君人执信，臣人执恭，忠信笃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一句话，要恭恭敬敬地做统治者的忠实奴才。这也就是“替天行道”这个投降纲领的实质。用儒家的“天命论”代替农民革命论，把起义搞成“替天行道”，就不可能不导致向地主阶级投降。

毛主席说：“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农民所以起义，是为解除这种不堪忍受的剥削和压迫，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反对地主阶级的统治，反对王朝，反对皇帝。因为在封建社会，皇帝是地主阶级的总代表，王朝是他们进行阶级压迫的国家机器。“擒贼先擒王”。不反皇帝，就不可能反掉地主阶级的统治，而要反对皇帝，就必须反对儒家的“天命论”，反对他们那些忠孝仁义的反动说教。因为这些东西，是地主阶级维持统治的精神支柱，束缚人民的无形枷锁，皇帝的护身符。“天之所置，其可废乎”，儒家就是这样用“天意”来为君主保镖的。其实，象“引首”中所渲染的那个天上的“玉帝”，不过是人间皇帝的投影，剥去灵光，只是地主阶级一个总头目罢了。

梁山头领朱贵说得好：“俺这里兀自要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的。”这是代表梁山革命派的声音，表现起义前期在晁盖领导下路线的正确，和后来宋江美化皇帝“至圣至明”，形成鲜明对比。《水浒》作者，鼓吹“天命论”，宣扬什么“忠义双全”，为皇帝撑腰壮色，就是反对农民革命。

宣扬历史循环论 作封建制度辩护士

如上所述，《水浒》作者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是由天帝的意志决定的。天帝派遣大仙下凡，就“扫清寰宇”，出现治世；放出魔王降生，就“兵戈到处”，出现乱世。由于这种原因，就形成了历史上的兴亡相代，治乱交替。他在“引首”中，把这种现象称为“天道循环”。

作者就是用这种唯心主义的历史循环论来“评议前王并后帝”的。照他说，“五代残唐，天下干戈不息”，是乱世；从赵匡胤建立宋王朝到宋哲宗时代，这一百多年，“天下尽皆太平”，是治世；由于天罡、地煞星“下临凡世”，“哄动宋国乾坤，闹遍赵家社稷”，再回到乱世；后来因为宋江投降，并帮王朝打平造反的方腊，又恢复了治世。在他看来，社会历史就是这样一治一乱地来回循环，虽有改朝换代，终于永恒还原，只是在封建制度内打转转，不会变样。其实，作者这个一治一乱的循环公式，也是孔家店的破烂。孟轲说过：“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孟轲是为复辟奴隶制造舆论，而《水浒》作者则是为腐朽的封建制度辩护，只有这点不

同罢了。

剥削阶级按照他们的统治思想和统治方式，把自然的天神圣化，并用历史循环论来解释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从而证明这种剥削制度是永恒的，破坏了又还原，而且这都是“天意”。这是由于他们妄图永远保持压迫和剥削人民的特权，阶级利益驱使他们不得不造谣骗人，并不奇怪。问题在于：《水浒》作者是怎样描写农民起义循环为地主阶级“治世”的，循环的条件是什么？这就需要查明情况，弄清实质。

作者认为，封建王朝只要善于运用招安和镇压的两手，扑灭了农民起义，就能由“乱”返“治”，“天下太平”。只举《水浒》中几个细节描写就能说明这点。宋江投降后，正式列队朝拜宋徽宗三次（一百二十回本作四次，二、三两次完全一样）。第一次是在刚刚接受招安之后，皇帝命令他们，朝见时要“脱去戎装惯带，各穿御赐红绿锦袍，悬带金银牌面”。这一“脱”一“穿”，宋江就由梁山寨主正式变为王朝奴才了。第二次是在征辽后，班师回京。这次，“遵奉圣旨：本身披挂，戎装革带，顶盔挂甲，身穿锦袄，悬带金银牌面”。请注意，那些标志奴才身分的御赐锦袄和金银牌面，没有改换，只是多了“顶盔挂甲”的戎装而已。这说明宋江以奴才身分兼充了武装打手，要去打那些不“替天行道”的“强盗”了。第三次是在打方腊之后，回京朝见。“天子特命文扮，却是幞头公服。”接着就大开“太平筵宴”，“庆贺太平”。作者在描写这些朝拜时，不但加了许多诗词韵语，烘染衬托，而且还怕读者健忘，写最后一次朝见时，又把前面两次朝见的服装变化重复了一遍。他这样精心安排，是为表现封建王朝由乱世循环到治世的转折的全过程。循环的条件和方法，就是收买象宋江这样的叛徒，用软刀子消灭农民革命，然后加以利用，用硬刀子去镇压其他农民起义。真是“图穷而匕首见”！什么“天道循环”，游转了半天，原来就是这么一回事！

“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我国封建社会发展到宋元时期，已逐渐衰落。由于王朝政治腐败，进一步暴露了封建制度的残酷性、腐朽性。阶级斗争十分激烈，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元朝末年达到高潮。作者正在这个农民起义高潮时期，写了这样一部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长篇小说，鼓吹历史循环论，充当封建制度的辩护士。其目的何在，为谁服务，不是很清楚吗？

作者既然那样歌颂导致地主阶级“天下太平”的投降主义路线，那么，对于打乱封建秩序的农民革命，当然就不怀好感了。《水浒》虽然写的是农民起义题材，但对农民革命却作了许多污蔑和歪曲。首先，它把农民起义看作是历史的倒退，咒骂起义人物是从万丈地洞里冲出的“一道黑气”，这些“魔王”出世，“必恼下方生灵”。其次，它把地主阶级迫使农民起义，歪曲为奸逼忠反，把深刻的阶级根源掩盖了。还有，作者不但对方腊起义作了恶毒的丑化，而且对梁山革命派人物性格也作了许多歪曲。好象上梁山就是为着“论秤分金银，换套穿衣服”的生活，把农民的革命歪曲为江湖义气。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在《水浒》中没有得到反映。过去有人把它吹捧为“农民革命的史诗”，那是完全错了。

作者更为恶劣的，是鼓吹所谓“天道循环”，把宋江投降描写为历史的必然。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是在“还道村”接受九天玄女的“法旨”开始出笼的，纲领和步骤都具体规定了。这个“还道村”的名子，大有文章呢。“原来团团都是高山峻岭，山下一遭涧水，中间单单只一条路。入来这村，左来右去，只是这条路，更没第二条路。”在这里，作者明目张胆地把地主阶级的统治吹嘘为永远突不破的“高山峻岭”，胡说起义就陷入天罗地网，只有投降一条路，没有第二条路。他完全抹煞了农民起义的革命路线，彻底否定封建社会农民起义的重大意义，

（下转第94页）

声东击西的手法，同时又要提高警惕，常备不懈。“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苏修胆敢侵犯我国，必将自食其果。

最后，我们可以略为分析一下这部电影剧本的题名。什么是“崇高的称号”？身为军人，为沙皇政府征战沙场，到处侵略扩张，这是“崇高”的；军人就是“崇高的称号”，不论你是老沙皇时代，还是新沙皇时代，一视同仁；如果在侵略战争中立下汗马功劳，还应给予十字章等各种勋章，或树碑立传，以资崇高的奖励，借以刺激人们狂热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和军国主义情绪，便于为对外扩张搜罗炮灰。剧本的结尾就歇斯底里地狂叫向全世界进军：

骑士们，朋友们，准备出征吧！

嘹亮的军号声召唤我们去建立功勋！

这不禁使人想起叶卡捷琳娜女皇时代的诗人杰尔查文。十八世纪末，当沙皇俄国的军队从土耳其手中陆续夺取了大片土地时，他一时“诗兴勃发”，写下了两行诗：

俄罗斯啊，同盟对你有什么用？

迈步前进，全世界就是你的。

一个呐喊“迈步前进”，一个叫嚣“出征”，一脉相承，遥相呼应，可谓道不失孤。但很可惜，全世界不是“你的”，全世界是人民的。人民大众起来，叶卡捷琳娜就倒了，她以后的历代沙皇也一个一个地倒了。我们坚信，新沙皇也必将踏着 he 先辈的足迹，在人民革命战争的烈火中颓然倒下。

（本文在中国人民解放军 39312 部队的指导与帮助下写成。）

（上接第40页）

这是对历史的最大歪曲。过去在《水浒》评论中，有人把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说成是“农民的局限性”，不自觉地散播它的反历史的思想，混淆了农民革命和宋江投降的两条路线的界限，那更是错了。

毛主席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由于阶级斗争和数百次农民起义，打击了封建统治，才推动我国封建社会不断发展。“一治一乱”，正是在阶级斗争推动下社会和平发展和革命变革互相交替的一种历史现象。《水浒》作者，完全抹煞了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把它移到“天帝”那里，而且荒谬地认为历史的变化就是循环的还原，根本否认社会历史总在不断前进，总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这种阶级意识，决定他写的《水浒》只能宣扬投降主义，为封建统治阶级效劳，给人民做反面教材。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过去在评论《水浒》中，有的以反为正，为它辩解。这个教训，我们应当深思。现在充分利用这个反面教材，通过对它的评论和讨论，提高我们识别投降派、批判投降派的能力。这对于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是有重大意义的。